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及实践

奂平清 王策明

【摘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民族团结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强调民族间情分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这一思想及实践,在民主革命时期,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实现,在改革、建设和复兴的各个历史时期,继续发挥着民族团结与社会整合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深入总结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和宝贵经验,分析其理论和思想基础,对推动新时代民族理论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民族情分

【作者简介】奂平清,男,甘肃舟曲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王策明,男,四川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青海民族研究》(西宁),2024.1.79~8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研究”(批准号:22JJD840015)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开辟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经验,核心是通过增进民族间的情分和大家庭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工作并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49年,《共同纲领》中“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梳理和分析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发展脉络和实践经验,阐释这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基础,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和知识体系、推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在民族工作实践中逐步孕育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改革和复兴不同历史时期,推动“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向纵深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已成为描述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话语和凝聚各民族人民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思想与民族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正确认识到,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在外是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在内是封建军阀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压迫。只有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联合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才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以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

统治的总方针,党的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共六大以后,党在民族地区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并在地方委员会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来看,我党虽然自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尚未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受苏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理论的影响较大,照搬苏俄民族工作经验的成分较多。不过,党的民族工作在这一时期仍有一定成就,如在少数民族中建立革命组织、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指导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为党进一步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的初步形成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进入民族地区后,党认识到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阶段,他们的民族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宣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将各民族团结凝聚为一体。为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一方面遵照马克思列宁民族理论基本原则开展民族工作,同时也积极主动与少数民族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长征期间,党和红军打出“回、彝、汉人是一家,自家人不打自家人”^[1]“回番夷汉穷人是一家,大家共同联合起来”^[2]“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3]等口号,“民族大家庭”思想在党的革命实践中得以萌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日矛盾不仅是阶级矛盾,更是民族间的矛盾,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党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党的“中华民族”思想也正式确立。这一思想强调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各民族有共同的优秀历史文化,各民族是利益和命运相关的整体。1938年,杨松在《论民族》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4]。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中华民族除汉族以外,还包括数十种少

数民族;八路军政治部于1939年12月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强调,中华民族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6]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文称“在日寇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7],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8]。“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9]

党在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和“民族大家庭”思想,把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视作兄弟同胞间的关系,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一律平等,提倡各民族互相帮助、团结友爱,鼓励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联合奋斗。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还未彻底清除,英国在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煽动叛乱,妄图维持其殖民统治。国内民族剥削和压迫问题依旧存在,民族间的猜忌、隔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时期的民族工作经验,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以促进民族平等、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10]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文

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关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造成了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政治、组织等各领域的拨乱反正。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12]1981年,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思想。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 multi-ethnic 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3]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澄清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作出确认,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1990年,江泽民在新疆视察时要求“一定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头脑中牢固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4]，“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关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要求“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5],将“和谐”理念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得以升华,理论也得以创新和发展,进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民族问题,更加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明确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2014年,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16]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中华民族理论有了更进一步创新,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出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7]。

2015年,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8];2017年,党的十九大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9];2019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在理

论层面有更为系统的创新性表述,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0]。这些思想与理论表述,使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作出充分肯定,有利于激发各民族自豪感,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21]。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22]。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3]。

党在新时代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论断与重大战略思想,为新时代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引。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讲话中,以及党和国家的相关文件中,常用老百姓喜

闻乐见、新鲜活泼的概念和话语,如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有精神家园,以及“石榴籽”等,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智慧的话语,深入人心,激起大众共鸣。

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尊重、爱护和帮助少数民族,并因此获得各少数民族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也正是依靠各民族的支持和共同团结奋斗,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得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在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践

一是开辟革命根据地,谱写民族关系新篇章。1934年11月,红军抵达湘桂黔边界,在即将进入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指出在苗瑶民族中开展工作应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民族联合等原则,并要求“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24]。红军进入民族地区后,注重与少数民族建立兄弟般的亲密关系。1934年12月9日,红军在广西龙胜县龙坪大寨和广南寨宿营期间,发生敌特纵火案,周恩来亲自指挥战士灭火,保护了当地瑶、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的住宅,并给受灾严重的家庭发放了救灾款。龙坪大寨的侗族群众为感念党和红军的恩情,把寨中一所修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鼓楼改名为“红军楼”。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彝区后,在借道北上经过果基家支的地盘时,被彝民拦住了去路,刘伯承与其首领小叶丹结为兄弟,歃血为盟。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赠予小叶丹,并任命他为队长,红军在果基家支的护送下顺利通过彝区。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的民族大家庭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对党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增强。

二是争取蒙古族、回族共同抗战,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蒙古族和回族由于长

期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他们在抗战上态度摇摆消极,争取蒙古族和回族参加抗战,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七七事变后,为避免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成吉思汗陵寝煽动蒙古独立,国民党政府和蒙古族上层人士决定迁陵,将成陵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迁移至甘肃榆中兴隆山,途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域延安等地。1939年6月21日,成陵抵达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延安社会各界人士举行盛大祭典。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在祭文中写道:“日党运兵,为患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25],表达了我党希望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愿望。1939年至1946年,中共每年都在延安举行成吉思汗祭典。在1940年的夏季公祭中,吴玉章撰写的祭文称“汉蒙血系,同出炎黄,祖宗之烈,民族之光。救国救种,旨在团结,阅墙燃莫,庸奴自贼,中山遗训,五族共和。尔毋我诈,我毋尔虞,矧在蒙胞,悲歌慷慨,奋赴同仇,执戈前列”^[26]。这些祭典活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成吉思汗被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的民族英雄,坚定蒙古族等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日的决心。

由于长期以来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回、汉两族人民间有很深的隔阂和仇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频繁派遣特务潜入甘宁青及其邻近的阿拉善和额济纳等地建立据点,企图利用回汉矛盾开展民族分裂运动。中国共产党将回族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在政治上坚持回族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积极帮助回族群众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充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党的这些政策对团结回族共同抗日有积极作用,1937年以后,不断有回族迁入陕甘宁边区,到1945年10月,边区的回族已由原来的36户增至1000多户,近5000人。^[27]边区的回、汉人民间充溢着兄弟般的友爱,边区在回族同胞的眼中已成为他们自由发展的“天园”^[28]。

(二)在建设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践

第一,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结束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操纵下,西藏噶厦政府企图搞“西藏独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开展和平解放西藏的民族工作。1949年9月2日,新华社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地,西藏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29]。1951年4月29日,李维汉在与西藏代表的首轮谈判中称“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把事情办好”^[30]。同年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双方谈判代表张国华和阿沛时告诫他们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31]5月23日,《十七条协议》得以签订,实现了对西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西藏后,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充分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学习藏语,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解放军还开展了“满缸运动”,为藏族家庭挑水,并帮助他们打扫庭院、打柴背草等。^[32]西藏和平解放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继而开启西藏民主改革和发展建设之路,使藏族群众切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关怀与支持,培育和加强了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第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经慎重考虑及深入研究,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同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少数民族较多的行政区也相继设立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为推动实行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中央和地方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在“慎重稳进”方针的指导下,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民族工作者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干部培训工作。195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工作也迅速推进。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中,秉着商量办事、综合权衡的大家庭方式处理具体民族事务,贯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政治伦理,坚持深入基层、凝聚人心的群众路线,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33]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重要思想基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三)在改革时期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实践

第一,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3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这是一次体现民族平等团结的盛会,对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产生了重要影响。^[34]改革开放后,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国家体委将此次运动会定为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民运会”),并从1982年起,每四年举办一次民运会。在举办过程中,也曾存在移植现代奥运会符号,在奖牌、会徽、火炬、媒体话语等方面倾向于“锦标主义”的问题,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自强,民运会在开幕式、会徽、赛会制度、官方和媒体话语等方面,“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和符号意义日益凸显和强化。^[35]每届民运会观众达到上万人,各族人民聚集在一起交流学习,对彼此的了解更深入,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更为深切,民运会成为加强各民族情感联系、强化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大家庭认同的重要平台。1991年,第四届民运会会歌《爱我中华》中,“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的歌词,生动展现出我国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情景,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深受全球华人喜爱,并被编入初中生音乐教材,还被选为“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的歌曲。

第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6]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

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7]正是按邓小平的构想,党中央在世纪之交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逐步成为现实。^[38]1999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39],同年9月,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要求有关部门加紧研究,要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历史机遇。2000年3月,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实践。为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务院将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直接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没有被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的民族自治地方,则由省级人民政府参照西部大开发相关文件,予以政策支持。此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519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3475亿元,年均增长12.8%,占西部地区比重由2000年的31.2%提高到2009年的35.1%。^[40]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结构逐步趋向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事业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促进了各民族协商办事、互相帮助的兄弟情谊及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四)在新时代促进各民族共享发展的实践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也不能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缩小民族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党和国家通过财政拨款帮扶和救济少数民族。但由于国家经济能力有限,这种帮扶和救济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施对口支援、沿边开放、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通过生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要求“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41],党的扶贫工作从开发式扶贫转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而言,“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是一个艰巨任务。党在新时代继承

和发扬“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脱贫情况和成效,在脱贫攻坚阶段,深入贫困地区考察调研并部署工作。2020年底,我国如期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民族经济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中国脱贫攻坚的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为世界其他遭受贫困困扰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其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和共同富裕。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达到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多数分布在乡村和西部地区,为促进各民族共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和教育均衡发展等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推动农业现代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使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这一战略有助于增进地区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各民族共享发展机遇,实现民族间的互利共赢。教育均衡发展战略致力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通过在发展较落后民族地区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学校设施、提供奖学金和减免学费等措施,保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

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理论与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中华各民族数千年来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可以说是“两个结合”的典范。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同时,十分注重对民族关系问

题的研究,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继承者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即民族平等理论;第二层次,是民族关系的过程理论,即民族发展和共同繁荣理论;第三层次,是民族关系的目标理论,即民族融合理论,三个层次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2]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关系的融合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形式上的平等;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时期,用社会主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促进各民族发展和共同繁荣;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时期,区域隔离被打破,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彻底消亡。其中,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融合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期,经过社会主义阶段的高度发展繁荣,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大幅度提升,各民族素质普遍提高,历史遗留的民族间各方面的差异基本消除,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民族融合最终得以实现。

马克思1843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提出了犹太人的民族平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批判了资产阶级虚伪的民族平等观,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43]。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优点和长处,都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绝对没有天生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分。恩格斯于1876—1878年撰写的《反杜林论》,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基本思想,其中也包括民族平等的内容,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民族理论家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包括:第一,主张一切民族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第二,要求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第三,要求铲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第四,不仅要遵循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还要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并消灭剥削制度后,各民族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得以实现。但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各民族的事实平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斯大林指出:“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长期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要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44]

自人类历史上出现民族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就没有中断过,在此过程中,促进民族间融合和共同性的因素也不断积累和加强。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5]。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46]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间互动的增加,各民族在保留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共性日益增多,各民族团结成一个有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命运和共同目标的整体。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这一思想及实践的重要方面,一是坚持国内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先进与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二是将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视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强调各民族友爱合作、团结互助、共同发展进步。三是提倡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打破民族壁垒与隔阂,形成和谐民族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在实体,其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连续不断地兼并战争打破了“华夏居中,四夷配以东南西北”的民族分布格局,“四夷”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华夏”民族在与他们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华夷一体”“天下一家”这一主导性的中国民族关系思想。

西汉时期,贾谊以“华夷首足论”分析汉族与匈奴的关系,认为汉族与匈奴是同一个身体的两个部分,二者紧密联系且无法分割。司马迁深入考察匈奴、闽越、东越等民族的族源后指出,这些民族也是黄帝子孙,他们与汉族是兄弟同胞的关系。西汉时期形成和亲制度,汉高祖时有宗室翁主嫁为匈奴单于阏氏,汉武帝时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先后嫁入乌孙,汉元帝时昭君出塞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通过和亲,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建立起亲属关系,达成分疆自守、互市贸易、和睦相处的约定,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多个政权并立之局面,但统一与和平的大势并未改变,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并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政治目标。这一时期,出于结交同盟的和亲十分常见,相互间的支援合作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界限,民间族际通婚也越来越多,促进了南北交融、华夷互鉴,为隋唐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也是各民族相互杂居共处和大融合的时期,民族关系思想也有新发展。如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47]唐朝时期的和亲更具有主动性、开放性和进步性。唐太宗时期,吐蕃出于与唐王朝交好的目的请求和亲,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入吐蕃,并带去许多农作物种子、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能工巧匠,唐朝与吐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更为密切。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去许多书籍和音乐艺术技艺,增进吐蕃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唐蕃关系更加亲密,往来更加频繁。唐穆宗时期,唐与吐蕃结成“舅甥”关系,唐蕃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元朝时和亲相对较少,但民间族际通婚较为普遍,如当时被称为“回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后,形成了回族这一中国特有民族。清朝时期,统治者强调“满汉一家”“满蒙一体”“满藏一体”,和亲制度也进一步发展成为民族联姻,满蒙联姻是清朝的基本国策之一。满族一方面承袭了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和汉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与蒙古族等边疆民族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联姻等方式,满族将这些思想和文化传入蒙古等地区,促进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交流,边疆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进一步加强。清政府的垦边政策,推动中原地区的汉族向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迁移,汉族与少数民族共享土地和技术资源,族际通婚也明显增多,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也得以增进。

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48]。和亲、通婚、联姻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桥梁,各民族在互动往来中交汇和合,血脉相连的情感联系培育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形成的“天下一家”“华夷一体”等民族关系的优秀传统文化。国民党蒋介石关于中国民族的“宗支说”,虽然也以中国家族和伦理文化为基础,但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不同,“宗支说”违背孙中山“五族共和”论,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同化,带有明显“大汉族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则更强调中国各民族间的家庭成员关系性质,注重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9]。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充分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可以说是“两个结合”基础上的重要理论创新,既助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也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民族平等、推进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促进民族融合,使各民族整合为一个共同体,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50]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则,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民族融合。而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强调各民族要像家庭成员一样,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及实践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坚持“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并在实践中积累得出许多解决民族问题的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族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分裂势力,基本使各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得以消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建立了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举措具有良好成效,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党带领各兄弟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初步解决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51]。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理论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也是党“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一思想强调各民族不仅要实现形式上的平等,还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鼓励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积极参与伟大祖国的建设,在经济文化上友好交往、在生活中和睦相处,提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强调民族情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民族”常常被视为“具有亲属关系的共同体”,是“其成员之间由于出生境况相同而形成的密切关系、占据广阔领地、有时间深度的共同体”。^[52]中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间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更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兄弟或家人间的关系。潘光旦曾批评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处理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上“暴力用过很多,理论争论也多”,但从形成“团结与统一的立场”和实现“一个更坚强和谐的‘我群’”这一目的而言,“确是失败了”。在一国之内,应“当作一家看待,且进而使其在精神上成为一家,成为一个虽庞大而更巩固的‘我群’”,要“多多地运用情分”,就像“兄弟房分之间的争论,绝不用力与法来解决,而用情分来解决”,只不过“以前主持处理家事的人是一位家长,如今主持处理国事的人该是全国的人民”。^[53]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民族事务中,始终秉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理念,大家庭内的各兄弟民族商量办事、互相帮助,讲民族间的情分,充分尊重各民族情感。这种思想和做法,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结语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将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定位为完全平等的兄弟同胞关系,坚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主张各民族同心同德、友爱合作、共同进步,倡导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更多地讲民族间的情分,这一思想及实践,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变的是民族间不平等的关系”^[54]的问题,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民族隔阂逐步消除,由生存环境和生产力水平导致的发展差距持续缩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也超越自然地理界限的阻隔逐渐走向交融。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法宝。

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也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将“中华民族”比拟为类血缘的“大家庭”,并以此来描述和阐释中国各民族间关系、家国关系、海峡两岸关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话语。^[55]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仍面临诸多挑战。国内方面,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民族矛盾和纠纷问题依旧存在。国际方面,有些西方国家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制造民族分裂活动,企图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因此,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广泛宣传“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深入挖掘和拓展“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创新“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的实践方式,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2][3][4][6][7][8][2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50.264.277.767.808.682.603.245.
- [5][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2.623.
- [10][11][29]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第一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416.527.404-405.
-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3-4.

[14]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60.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4.

[16]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 <https://www.neac.gov.cn/seac/c100500/201405/1085610.shtml>, 2015-09-24.

[17]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举行[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9/29/content_2758816.htm, 2014-09-29.

[18]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EB/OL]. 共产党员网, <https://news.12371.cn/2015/09/30/ARTI1443618137426840.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2015-09-30.

[19]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017-10-27.

[20][48][50][51]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7.6.1-2.8.

[21]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 2021-08-28.

[2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5651269.htm>, 2021-11-16

[23]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40.

[25]本市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成吉思汗祭典[N]. 新中华报(第42号), 1939-06-27(3).

[26]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夏季公祭[N]. 新中华报(第150号), 1940-07-30(5).

[27]李伟. 抗日战争中的回族[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58.

[28]民族问题研究会编. 回回民族问题[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132.

[30]叶介甫. 李维汉: 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首席代表[J]. 新西藏(汉文版), 2018, (1): 54.

[31]降边嘉措. 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J]. 中共党史研究, 1998, (1): 14.

[32]孙海芳, 青措加. “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基于“和平解放西藏”历史事件的分析[J]. 西藏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2): 11.

[33]常安. 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J]. 学术月刊, 2019, 51(9): 95.

[34]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53年)[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 <https://www.neac.gov.cn/seac/c102720/201904/1133346.shtml>, 2019-04-30

[35]王兰. 从“锦标主义”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全国民族运动会价值观的嬗变[J]. 体育学刊, 2019, 26(4): 22-29.

[36][37]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64.277-278.

[38]陈国新. 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与各民族共同繁荣[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6): 10.

[39]江泽民.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457.

[40]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编著.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专题数据手册[M].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 64.

[41]续写脱贫攻坚、有效扶贫新篇章[EB/OL]. 人民网,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0/29/c1003-29614856.html>, 2017-10-29.

[42]刘敏. 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兼谈民族“交融”与民族“融合”的同质性[J]. 西北民族研究, 2015, (2): 25-32.

[43][德]马克思, [德]恩格斯. 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194.

[44][苏]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第五卷)[M].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47.

[45][德]马克思, [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1.

[46][德]马克思, [德]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

[47](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Z].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329.

[49]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0.

[52][美]斯蒂芬·格罗斯比. 民族主义[M]. 陈蕾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13.

[53]潘光旦. 这是讲情分的时候了(1945)[A]//潘光旦文集(第十卷)[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4-56.

[54]费孝通.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0, (1): 2.

[55]孙保全. 中华民族大家庭: 一种国民整合的政治符号[J]. 广西民族研究, 2019, (5): 11-19.